



中国现代 文学家

—— ZHONG GUO XIAN DAI WEN XUE JIA ——

主编 蔡世连 郭德芳

北京燕山出版社

语文大视野(8)

中国现代文学家

主编 蔡世连 郭德芳
编著 蔡世连 杨莉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文大视野/蔡世连, 郭德芳主编. —北京: 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06.6

ISBN 7 - 5402 - 1041 - 9

I .语… II .①蔡… ②郭… III .语文课 – 中小学 – 课外
读物 IV .G634.3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22796 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100 号 100006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74.5 印张 1738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全 10 册):298.00 元

编者的话

中学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阶段，语文教育又是素质教育的基础的基础。但语文教学的历史和现状却很难令人满意。“费时多而收效低”几乎是人们对它的基本评价。原因何在？对语文教学的性质与任务的偏狭性理解即是造成一系列失误的根源。正是在历史反思的基础上，人们对语文的性质给以重新定位：语文既具有工具性，又且有人文性，或者既对立又统一，不可分割。如果把语文看作一个大文本的话，语文教学的目的既不在于单单求“言”——把握它的工具性，也不在于单单求“意”——把握它的人文性，而在于言意并求，尤为重要的是，还要求“道”——把握语言表达、语言思维的基本规律，建构既符合科学性又具有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从而真正提高一个现代人的文化素质。因此，以语感训练为中心的多读多写多练，仍是提高语文水平的看来古老笨拙实则最为有效的途径。大语文观、大教材观、大课堂观等等语文教学的新思路也由此而出。

语文教学需要一个大视野，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目的即是为了给这个视野提供一片必不可少的风景。

我们了解并尊重求知欲旺盛的中学生的阅读需要和阅读特点，为此，在本书的编写上我们注意了以下几点：

一、内容设计上，我们根据语文课既具工具性又具人文性



的特点，力图将零星散布于语文课本中的语言学、逻辑学、文学、文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分门别类加以系统介绍，一来试图矫正知识点过于零散的缺陷，二来为读者学言、明意、悟道提供一些帮助。

二、文体风格上，我们追求知识性、科学性和生动性、趣味性并重的原则，力避正襟危坐式的说教。如果读者能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境阅读此书，将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由于我们才力有限，失误之处肯定难免，因此，除向读者预致歉意外，诚恳地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丛书能顺利面世，多赖本书的策划者陶继新和责任编辑里功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向他们致以真诚的谢意。



编 者

目 录

民族魂——鲁迅 (1)
一、从家道衰败中看到世人真面目 (1)
二、南京，接受新思潮的洗礼 (3)
三、“我以我血荐轩辕” (4)
四、从热情欢呼到冷静思索 (8)
五、伟大的“呐喊” (10)
六、“彷徨”中的上下求索 (12)
七、从厦门到广州：不断进击 (16)
八、“天火”燃烧焕新颜 (20)
九、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23)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郭沫若 (27)
一、少年叛逆者 (27)
二、凤凰更生歌 (29)
三、办《创造》，得“宝筏” (33)
四、在北伐和南征的途中 (35)
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者 (37)
六、在民族解放的洪流中 (40)
七、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 (44)
八、熏风永驻，遗范长存 (46)



语文大视野

伟大的革命文学家——茅盾	(48)
一、早慧的文学少年	(48)
二、新时代的“盗火者”	(50)
三、在革命的洪流中	(53)
四、时代风云上笔端	(54)
五、光焰炯炯灼子夜	(58)
六、在抗日的炮火中	(60)
七、清风晚节老梅香	(64)
把心交给读者——巴金	(68)
一、社会中的“家”	(68)
二、“巴金”的诞生	(73)
三、大哥与《家》	(76)
四、寒夜漫漫盼天明	(79)
五、生命的随想	(83)
人民艺术家——老舍	(85)
一、在红旗下的苦难人生	(85)
二、从伦敦到新加坡	(87)
三、从济南到青岛	(91)
四、从武汉到重庆	(95)
五、新时代的人民艺术家	(98)
中国的莎士比亚——曹禺	(101)
一、万家之宝	(101)
二、于无声处听惊雷	(104)
三、茫茫长夜望日出	(106)
四、从《原野》到《蜕变》	(109)



目 录

五、《北京人》、《家》轰动山城	(113)
六、新中国剧苑的辛勤园丁	(115)
洒向人间都是爱——冰心	(117)
一、风雷中的雏燕	(117)
二、初升的星辰	(119)
三、乡愁和恋情	(122)
四、“微怜松石瘦，贞静立山头”	(127)
五、漫漫人生路，殷殷爱国情	(130)
扑火的蛾，傲雪的梅——丁玲	(134)
一、一个绝不向命运低头的女孩	(134)
二、“文艺的花是带血的”	(136)
三、面对生与死的选择	(139)
四、“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42)
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146)
六、傲霜的梅	(148)
诗人、学者、斗士——闻一多	(151)
一、“五四”的洗礼	(151)
二、《红烛》、《死水》和新格律诗	(153)
三、学者生涯	(157)
四、走向十字街头	(160)
五、拍案而起	(162)
六、“最后一次讲演”	(165)
与时代同悲欢——艾青	(169)
一、狱中诞生的歌	(169)
二、由绘画到诗歌	(170)



诵文大视野

三、为抗战而歌	(172)
四、解放区的歌手	(175)
五、歌声漂洋过海	(179)
六、荒漠开拓的歌	(182)
七、新生的歌	(184)
人民的作家——赵树理	(188)
一、民间学校	(188)
二、为大众而创作	(189)
三、两篇杰作、一部“史诗”	(193)
四、赵树理方向	(195)
五、“说说唱唱”	(196)
六、心系农村	(198)
七、“生于《万家楼》，死于《十里店》”	(200)
八、《回忆历史认识自己》	(201)



民族魂——鲁迅

一、从家道衰败中看到世人真面目

1881年9月25日，在浙江绍兴城内周家，诞生了一个婴儿，他最初取名樟寿，字豫山，后改为豫才。1898年在南京上学时改名树人，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署了个笔名叫“鲁迅”。



周家是绍兴的望族，鲁迅一家属于周家“覆盆房”的一个分支。“覆盆房”全盛时占地3000多亩，还有七八座当铺。直到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革命军进入绍兴之后，才打破了这个家族的显赫局面。尽管如此，鲁迅出生时，家中仍有四五十亩水田和一些店面房子，他的祖父周介孚（1838—1904年）又正在做京官，是一个丰衣足食的“仕宦之家。”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1861—1896年），是个秀才，屡次乡试，终未中举。因仕途不顺，脾气颇坏，但他性情倔直，对孩子管教是很严的。有时小孩子受人欺侮，回家告诉他，他就会问：“你先去欺负他们吗？”若答没有，他又会说：“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来欺负我呢？”他认为，人如受欺，当以强硬相对，但无端欺人，却是不应该的。后来鲁迅很受这种思想影响。

母亲鲁瑞（1857—1943年），娘家在绍兴乡下安桥头。她是咸丰年间举人鲁希曾的第三女，“以自修得到能看书的学力”。1880年嫁到周家，共生育五个子女，樟寿老大，依次为櫆寿（周作人）、端姑（未满1周岁而殇）、松寿（周建人）、椿寿（6岁夭亡）。她有主见，待人宽厚，能接受新事物，富同情心——这都给鲁迅以很大影响。

鲁迅7岁入私塾，先从远房的叔祖父玉田先生学《鉴略》，12岁又被送往三味书屋从师寿镜吾先生读《四书》。他受的虽是传统的封建教育，但由于和大自然的接触、和下层人民的接近，他从小反感封建礼教。比如他在翻看《二十四孝图》时，看到“老莱娱亲”，便觉肉麻；看到“郭巨埋儿”，便觉可怕。他后来写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二十四孝图》等文章就真实记录了他少年时代的思想。

1893年2月，曾祖母病逝，周介孚丁忧回家。同年秋，浙江举行乡试，主考和周介孚相识，亲友本家便凑了一万两银子，托介孚去贿赂主考。不想事情败露，周介孚因此下狱。这使周家受到沉重打击。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变卖田产，各处疏通。在祖父被通缉期间，鲁迅兄弟便逃到皇甫庄、小皋埠去避难。由于家庭变故，世态炎凉，这次竟受到不同以往的冷遇，被称为“乞食者”。同族的长辈也看不起他们，甚至加以欺凌。而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孩子，却同过去一样殷勤好客，热情接待。两相对比，鲁迅切身感受到上层社会的虚伪、丑恶和劳动人民的纯朴、善良。

由于“科场案”的打击，周伯宜也很快病倒，1894年冬突然大吐血。为了给父亲治病，鲁迅作为家中长子，经常出入

于当铺和药铺，看够了世人的白眼。周伯宜于 1896 年病故，周家也彻底败落。

周伯宜逝世不久，本家长辈集会商议，重新分配房产，他们趁周介孚坐牢，欺负鲁迅一家，分给他家的房屋又小又差。鲁迅虽年轻，但据理力争，拒不签字。祖辈人声色俱厉地强迫他，他始终未屈服。回忆这段经历，他曾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后来他一直为受压迫受损害的人民而呐喊奔走，战斗不息，这与他少年时代切身经验也不无关系。

1898 年，鲁迅 17 岁，面临人生抉择：或走科举老路，或另觅新路。他毅然选择了一条被当时人们看不起的新路：到南京投考不收学费的新学堂。从此，他退出了封建社会为世家子弟们划定的轨道，进入了一个新的空间。



二、南京，接受新思潮的洗礼

1898 年 5 月，鲁迅到了南京，先入江南水师学堂，后入矿陆学堂。同年，戊戌变法从轰轰烈烈展开到遭到血腥镇压，然而，由康、梁等人所主张的新思想却在全国无可阻挡地波及开来。

水师、陆师都是洋务派们办的军事学堂，校长称总办，照例由候补道充任，学校俨然官场，一片乌烟瘴气。陆师总办好一些，鲁迅入学那年，总办是懂德文的钱德培，第二年是倾向维新的俞明霞。大概与新总办的提倡不无关系吧，学校设了阅报处，可以看到《时务报》、《译学汇编》。鲁迅热心搜求新书报，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欧近代科学、哲学和文学方面的译著，



开始关心国内时事政治问题。他最喜欢读的是《天演论》。一个星期天，他一听说有这本书，赶快跑到离住处很远的城南去买。买回来翻开一看，眼前立即展现出一个新鲜的世界。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观念深深打动了鲁迅的心，怎样“自强保种”成了这时他思考的核心问题。他认为，只有坚决抛弃那些落后的、腐朽的东西，努力学习一些先进的新鲜的事物，才能找到中国人民生存的道路。在回忆这段生活时，他曾说：“一有空闲，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因为辣椒吃得太多，得了胃病，胃痛了，他把肚子顶在抽屉角上，继续学习。《天演论》有的章节，他熟到背诵如流的程度。



鲁迅在南京的几年，中国社会经历了触目惊人的巨变：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遭镇压、八国联军进京。这不能不促使他深长地思虑。为了“自强保种”，他自称“戎马书生”，喜欢练习骑马，从马上摔下，弄得头破血流，还是继续上鞍，“落马一次，即增一次进步”。他的骑术还不错，敢于和精骑善射的旗人子弟竞赛。当时他除了一方刻有“戎马书生”的篆体印章外，还刻有两个图章，一叫“文章误我”，一叫“夏剑生”。表明了他的爱国热情正在滋长。

1902年1月，鲁迅以一等第三名优秀成绩毕业，同年3月，赴日本留学，在他面前，历史又将展开新的一页。

三、“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到东京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兴起，孙中山、章太炎、邹容、梁启超等反清运动领导人，都在

日本传播他们的思想，著名的革命活动家秋瑾、陶成章、陈天华也都相继到了东京。鲁迅到日本后，感受到一种在祖国黑暗大地上未曾有过的革命气息，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日语，上课之余，经常出校门、赴会馆、跑书店、听讲演，积极投身反清爱国的革命运动之中。

那时的革命者极力鼓动去掉象征清朝统治的辫子，很使鲁迅高兴。1903年3月，他在弘文学院江南班中，第一个剪掉了辫子，表示反抗种族压迫的决心。剪辫之后，他激动地找到同学许寿裳，许高兴地评论道：“呵！壁垒一新！”为了给自己的决心作证，他特地拍了一张“断发照”，并在照片题诗明志：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那时，革命派的思想家们正在探索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弱点问题，梁启超曾撰文分析中国国民四大弱点：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鲁迅受这种思想影响，经常和许寿裳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少的是什么？它的病根在哪里？从此，“立人”、“改造国民性”成了他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他经常从思想革命角度思考中国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发表了《哀尘》、《斯巴达之魂》、《说钼》等文章，并于1904年正式参加了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

1904年4月，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入仙台医专学医。他想用医学促进中国人对于社会改革的信仰，平时可以救活像



他父亲那样为庸医所误的病人，战时可以去当军医。但是，当时正在进行的日俄战争打碎了他的这个梦。日俄战争是在中国领土进行的一场可耻战争，日本人抓住了一个据说是替俄国人做侦探的中国人，要枪毙示众，而周围的中国同胞竟无动于衷。鲁迅在课堂上看到这样一个时事幻灯片时，怒不可遏，好几天不能平静下来。在《藤野先生》一文中，他写下自己思想的转变过程。经此一事，他认识到，医学对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并不是一件很要紧的事。如果思想不觉悟，即使体格如何健壮，也只能做枪毙示众的材料，或当麻木的看客。他认为头等重要的事，还是改变人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文艺。于是，1906年他毅然退学，决心在“改变精神”上开出一条新路。



鲁迅来到文艺事业的入口处，最初的打算是刊行杂志，提倡一种文学运动。他把刊物取名为《新生》，为它的出版做了不少工作，约了一些稿子，封面、插图也都挑选好了。但当出版期临近时，最先就走掉一个得力的作者，接着又逃去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

《新生》的失败并未使鲁迅灰心，他继续阅读各种文学书籍，孜孜不倦地进行翻译和练笔。他把稿子一批批寄往上海商务印书馆，但又都一批批退了回来，可他仍是以锲而不舍的韧性，继续写作，他的思想也在这种磨炼中变得更为犀利了。1907年底到1908年，他先后在《河南》杂志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收获了弃医从文后的第一批成果，其中《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显示了鲁迅这一时期思想的锋芒。

《文化偏至论》系统表达了鲁迅当时的社会政治观点和文

化思想，他指责洋务派、改良派搬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法措施，乃是舍本逐末的学习方法，对于革命派大力宣传的反清政治纲领及其流血革命主张，也几乎不予呼应，而是独树一帜，标举“立人”。他认为“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和精神的振奋。这种思想虽不无乌托邦色彩，但却开思想启蒙之先声。

《摩罗诗力说》虽是一篇文学论文，但就其文化思想看，却是《文化偏至论》思想的深入和继续。他列举的摩罗诗人有拜伦、雪莱、密支凯维奇、显克微奇、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他们都是勇于反抗强暴的精神战士，他们的诗歌：“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振奋人心。鲁迅认为，中国要从精神萎顿状态中振作起来，正需要一批具有“摩罗”性格的启蒙家，打破民族之沉寂、精神之偏枯，这样中国才有希望。



1908年夏，章太炎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鲁迅、许寿裳、周作人等很想去听，但因时间冲突，便通过章太炎的女婿龚未生与章联系，另开一班。从7月21日始，鲁迅等人赴太炎先生寓所，听他讲学。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太炎先生讲了《说文解字》、《尔雅义疏》，还讲了一些文学知识。鲁迅本有旧学功底，经太炎大师指点，又向更渊博的境界挺进。他后来做学问的求实作风以及考据、校勘、整理文物的非凡功力，都与章太炎的影响分不开。

1908年，鲁迅还和周作人合译了《域外小说集》，介绍被压迫民族——特别是东欧和北欧弱小国家的小说，目的是借他人之新声，发国民之蒙昧。1909年2月至6月，《域外小说集》共印出两集，但未能收回成本，这不但没能把他打倒，反而更

坚定了他的意志。

四、从热情欢呼到冷静思索

1909年6月，鲁迅回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教员。因不满校方专制，翌年6月回绍兴，任绍兴府中学堂学监，兼任博物学、生理卫生学教员，不久又辞职。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11月杭州光复，越社在绍兴城里召开群众大会，邀请鲁迅参加，并推举为主席，由于府中无人主持，学生便乘革命形势，坚邀鲁迅返校，仍担任学监。



一天，鲁迅从家里到学校，沿途看见人们仓皇逃走，店铺也在砰砰地上排板。他立即赶到学校，一打听，才知道市民们听到清朝败兵要来绍兴骚扰的消息，所以人心惶恐。他认为要维护革命秩序，首先是安定人心，便立即组织武装演说队，印好传单，沿街散发，宣传革命道理。演说队中有人背着很重的毛瑟枪，有的手里拿着指挥刀。学生中有人忽然提出问题：“万一有人来阻拦，怎么办？”

“你手上的指挥刀是做什么用的！”鲁迅斩钉截铁地回答。

这次演说效果很好，队伍所过之处，人心很快安定，关了的店铺也陆续开门。“溥仪逃，奕劻被逮”的消息传遍全城，一时间，古城洋溢着胜利和欢庆的气氛。

不久，王金发（光复会会员）主持绍兴军政府，捉住了杀害秋瑾的主谋章介眉，并实行了一些改革措施。鲁迅在日本时与王相识，王金发便请鲁迅做师范学堂监督，范爱农做学监。但是没过多久，由于反动势力的包围和腐蚀，王金发政治上开